

乡村旅游应长短兼顾因地制宜

□□ 柯利刚



疫情之下,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。近日,一些地方推出一系列“刺激性”政策提振消费:继南京发放乡村旅游券之后,多个城市开始发放旅游消费券;浙江、江西及甘肃陇南等地尝试推行2.5天假期制刺激消费;广州、杭州等地计划增加小客车号牌指标发放,南昌更是直接补贴现金提振汽车消费……

以上种种,对于乡村旅游发展而言,都是利好政策。发放旅游消费券,等于为出游行“部分买单”,是金钱利好;推行2.5天假期制,有助于游客更好安排出游计划,是时间利好;提振汽车消费,有利于缩短城乡地理距离,是空间利好。经济上更加划算了,时间上更加充裕了,空间上更加便捷了,去乡村旅游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。

乡村旅游发展,除了以上利好的短期政策刺激,还要有长远的考量。新冠肺炎疫情对住宿餐饮、文体娱乐、交通运输、旅游等行业产生了较大冲击,但这种冲击是短期的,长期来看,我国经济稳中向好、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。兜里有钱,心中才有底,才有能力去追寻诗和远方。经济发展之于乡村旅游,可称有力之“春风”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,引发了人们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思考,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、城市乡村的关系和工作生活的关系等。将来,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这样一种共识:除了要在城市赚钱,还要去乡村休闲。

就宏观而言,乡村旅游的“春天”不仅会来,而且会在时间上,会来得越来越快;在地域上,会来得越来越广。但就微观而言,在乡村旅游的“春天”里,一些乡村能笑看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一些乡村会感慨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,也就是说,乡村应当发展旅游,但并不等于每一个乡村都适合发展旅游。

发展乡村旅游,要调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。旅游的需求,人人都有;但消费的能力,人各不同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,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,显然旅游需求是一种中高级需求。需求越是高级,就越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。旅游是要花钱的,经济发展水平越高,钱越多,旅游需求也就越能得到满足。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:2019年7月,全国共有320个乡村入围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,浙江省以14个乡村的入围数量居全国榜首。浙江的乡村旅游之所以发展得好,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根本保证。如果综合比较乡村旅游的数量、质量、收入等要素,我们会发现:东部省份的乡村旅游普遍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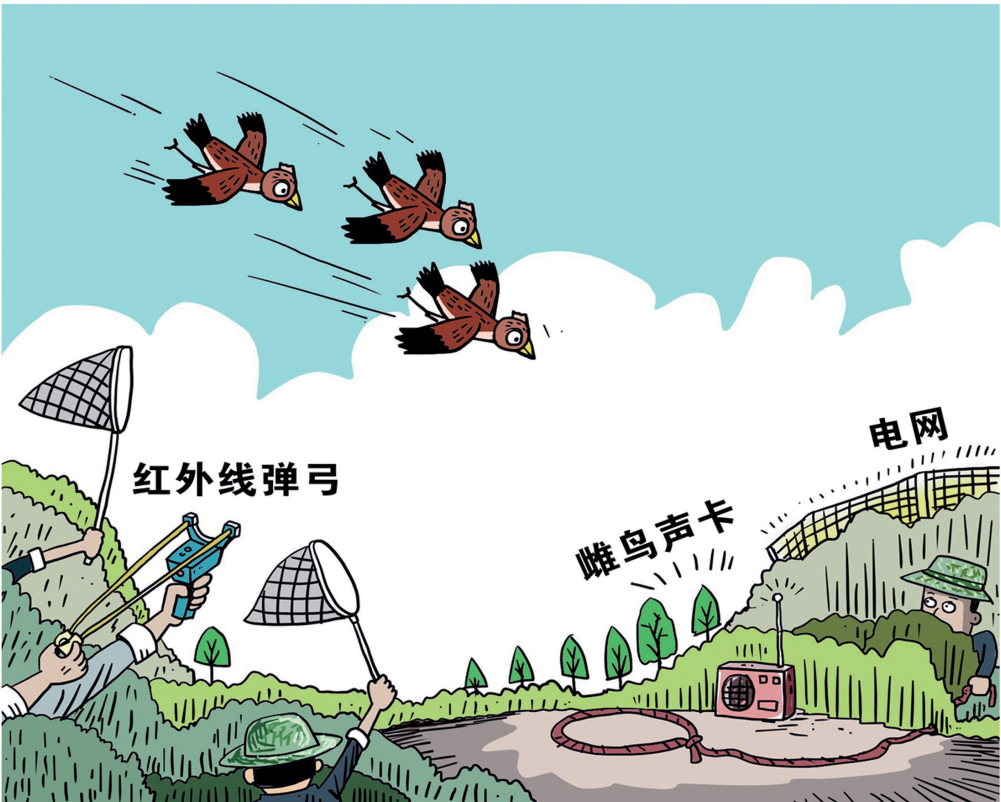
中部省份发展得好,中部省份的乡村旅游普遍比西部省份发展得好。一个重要原因便是,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。

发展乡村旅游,要考虑自身地理区位优势。乡村旅游领域,有一个普遍的规律,即“距离衰减规律”:距离城市越远,游客就越少,经营情况就越差,发展就越不理想。这个规律很好理解,因为乡村旅游的主体客源,不是村民,而是市民。市民去乡村旅游,地理上以城市为中心点,时间上以节假日为集中日,距离越近,路上花费的时间就越少,有效的度假时间就越多。这就决定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,市民游客会优先选择距离较近的乡村。放眼全国乡村旅游市场,2小时城市交通圈上的乡村旅游点数量,明显多于4小时城市交通圈。综上,就乡村旅游选址而言,有以下两条基本准则:越靠近城市越好,越靠近大城市越好。

发展乡村旅游,要立足稀缺优质资源禀赋。全国有几十万个乡村,每一个城市周边,或远或近,或大或小,都有不

少乡村。就整体数量而言,乡村并不是稀缺品。“物以稀为贵”,乡村旅游亦不例外。如何能够成为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,核心就是要挖掘稀缺、优质的旅游资源。近些年,乡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有:江西婺源、安徽宏村、浙江安吉、福建南靖、浙江桐庐等。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跨越地域,吸引全国人民前去游玩,关键在于它们有着足够稀缺、足够优质的旅游资源:它们或有秀美的自然风光,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;或有悠久的历史,如安徽宏村的明清民居;或有浓郁的民族氛围,如福建南靖的客家土楼。当然,稀缺、优质的旅游资源,也并非全是天然形成、历史赐予的,人工也可以打造,北京的古北水镇、武汉的花博汇等,就是从无到有规划设计出来的,目前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形势。

乡村旅游发展得好,既能保护环境,又能发展经济,是典型的绿色发展,很多乡村都跃跃欲试。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,但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,拍脑袋硬干蛮上。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,深入调研,分析有没有可能性,有多大可能性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,就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,打好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优”的“特色牌”;还要紧密结合市场,在初级阶段,市场需要什么,就要生产什么;在高级阶段,则要以自己的生产引领市场风向,只有不断打出“升级牌”,才能在乡村旅游的“红海市场”中活得久、活得好。



绘图:朱慧卿

兑现承诺,仍需加把火

□□ 庆海

熬粥时总掀开盖子,很难熬熟;生米即将煮熟熟饭,一撒火,会成夹生饭。

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,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。然而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使农产品滞销、农民返岗受阻,务工收入锐减。据对湖南、湖北、贵州等省的5个已脱贫摘帽贫困县调查显示,茶叶鲜叶价格比往年同期低1/3左右,农民工返岗平均推迟50天左右,给脱贫攻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

3月6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:这是一场硬仗,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,不能停顿、不能大意、不能放松。要以更大决心、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,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。打赢脱贫攻坚战,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仍需加把火,才能把耽误的时间补

回来,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挽回,如期兑现承诺,交上一份百姓满意的答卷。

兑现承诺,要勇于攻坚克难。俗话说,行百里者半九十。越到艰难时刻,越要迎难而上,否则就会半途而废。经过7年多精准扶贫,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去年底的551万人,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今年的52个,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。然而,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,都是“最难啃的硬骨头”。脱贫攻坚这场“大考”,是难攻的堡垒,更是庄严的承诺,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,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绷紧弦、鼓起劲,拿出滚石上山的勇气,尤其是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冲锋队、尖刀班作用,敢于硬碰硬,敢啃硬骨头,敢打攻坚战,以“钉钉子”精神锲而不舍地攻克最后堡垒,才能确保未脱贫人口

全部如期脱贫。

兑现承诺,要敢于披肝沥胆。尽锐出战,方能胜利收官。越是决战时刻,越要“强弓硬弩”,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尽管已有780个县脱贫摘帽,但脱贫摘帽只是贫困发生率低于3%,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贫困户全部脱贫。据统计,来凤、咸丰、龙山、永顺、剑河等5个已脱贫摘帽县,还有1.3万未脱贫人口。放眼全国,还有2707个贫困村、300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。数量虽然不大,但贫困程度深、工作难度大。当前,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最后关头,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个季度,时间相当紧,任务相当重。这就要求我们,必须以“时不我待、只争朝夕”的精气神,充分发扬“披星戴月、披肝沥胆、披荆斩棘”的优良作风,实施挂牌督战,才能如期兑现脱贫路上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庄严承诺。

□□ 李英锋

论压力下,甘家寨小区停止了收费,并启动了退费程序,但此类收费问题仍值得反思,对各地社区管理具有警示意义。

无论是“卫生费”,还是“过路费”,都不是谁想收就能收的。收费单位必须具备法定主体资格,收费项目、标准必须经过审批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。依据《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,小区可以收取清洁卫生费、秩序维护费等费用,但收费对象只能是本小区居民或居住者,外卖骑手骑车进小区送外卖属于外部服务行为,小区向外卖骑手收取“卫生费”“过路费”等费用。

小区直接或间接向外卖骑手收“进门

费”或“过路费”等费用并非孤例,在其他一些地方,也发生过或存在着类似问题。比如,重庆一个小区就曾从2019年10月底开始向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收取“设备磨损费”,每次1元,直到今年2月底,收费才被当地有关部门叫停。小区向外卖骑手收取“卫生费”“设备磨损费”等属于乱收费,在当前语境下,乱收费行为不仅加重了外卖骑手的负担,侵犯了外卖骑手权益,也降低了外卖服务效率,影响了复工复产的节奏,不利于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。

3月18日,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,围绕解决企业用工、资金、

原材料供应等需求,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,打通“堵点”,补上“断点”。显然,这一要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、在更多环节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3月23日,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发言人指出,要清理不合时宜的临时管制措施和不合理的证明、收费等规定,清查防控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违规收费。外卖骑手的“卫生费”或“过路费”等属于典型的“堵点”,正在应清理取缔的范围之内。

各地应该举一反三三废排查,看有无类似的乱收费情况,有无类似的“堵点”,有则坚决清理打通,无则加勉。



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,再次突出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,指出“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”。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性矛盾是:如何用不到世界10%(20.2亿亩)的耕地,解决好世界18%人口的吃饭问题。而

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,这个庞大人口对吃饭问题的要求,也在不断快速提高。即使我们把吃饭问题的标准,确定为世界

平均水平,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,也是巨大的。

为了确保我国当前和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,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:需要增产什么? 增产途径何在?

回答需要增产什么,要看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变化趋势。从国家统计局部门的住户调查数据看,2013年-2018年期间,我国居民人均粮食(原粮)消费数量,从149公斤逐年减少到127公斤,减少了22公斤。其中,人均谷物消费数量,从139公斤减少到116公斤,减少了23公斤。同期,肉蛋奶水产品人均消费数量逐年增加,从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。其中,人均肉类消费从33公斤增加到39公斤。

我国饮食习惯相近的日本,尽管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我国的4倍,但食物消费变化趋势,仍然与我国类似,只是变化速度更缓慢。2009年-2018年期间,日本人均谷物消费从92公斤下降到88公斤,其中大米消费从59公斤下降到54公斤;人均肉蛋奶水产品消费数量从160公斤上升到171公斤,其中,人均肉类消费从29公斤增加到34公斤。

据此,可以做出判断,在现阶段以及未来一个可预期的阶段中,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是:直接消费部分(谷物口粮)呈减少趋势,而间接消费部分(饲料粮)呈上升趋势。

这个结论非常重要。这意味着,我国未来稻谷和小麦的生产,只要保持稳定,就足以满足口粮消费的需要;而真正需要努力不断增加的,是饲料粮食的生产。

事实上,从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发展数据中,也可清楚地看出同样的发展趋势。1978年-2018年期间,稻谷生产从13693万吨增加到21213万吨,增幅为55%;小麦生产从5384万吨增加到13144万吨,增幅为144%;玉米生产从5595万吨增加到25717万吨,增幅为360%。而近10年的增长幅度,分别是:稻谷10%,小麦16%,玉米49%。也就是说,无论是40年还是近10年,稻谷生产的增幅都是最小,小麦的增幅大于稻谷,而玉米的增幅最大,是小麦和稻谷的数倍。

不过,由于各种原因,近些年生产的发展也不是完全与需求变化相一致的。根据国家有关粮食研究部门的信息,近两三年来,我国的玉米供求每年仍有上万吨的缺口,而稻谷和小麦是有剩余的,并且稻谷和小麦的使用去向中,均有1500万吨以上用于饲料。

在口粮消费中,今后可能更加多样化。不过,稻谷(大米)和小麦仍将是主体。人均稻谷消费,应该是下降态势,以前很少吃面的南方人,已经开始吃面食,尤其是商场和小吃店中五花八门的面食产品,大大便利了面食消费。对于小麦需求的发展态势,各方面的判断不尽一致。我个人的判断,可能是稳中有增,尤其是随着城市化发展,原来吃自产稻米的农民进城之后,会开始吃面食。饮食国际化的发展,也会增加面食的消费。

在大米消费中,对优质大米的需求日益提高,对普通杂交稻的需求会日益减少。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,大米会吃得更少,但同时要求吃得更好,吃价格高些的好大米。稻谷生产结构的变化,也反映出这种趋势。1978年-2008年期间,早稻生产减少了约40%;2008年-2018年期间,又减少了8%。而近10年来稻谷生产的增加中,83%是由黑龙江、湖北和安徽贡献的,这3个省的稻谷基本上都是质量更好的单季稻。

回答如何增产问题,只能从可利用的资源入手。资源有很多方面,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:土地和科技。人才和投入等资源,是通过作用于土地和科技,来表现出其重大作用。

在土地方面,首先要保护好耕地。现在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,关键要落实到位。在此基础上,就是切实提高现有土地的生产效率。其中最关键的,就是建设高标准农田。高标准农田有各种不同的要求,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平整、集中连片、设施完善。土地平整、集中连片,目的是方便使用大中型农机机械化作业,这是现代农业的必须;设施完善,主要是水电路等,这可以确保抗灾稳产。土壤肥力,可以通过长期的肥田耕作措施,不断改善提升。中央和地方支农资金,应重点投向这个方面。现在财政补贴支出的大头,是用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,当年花的钱,只对当年有用。而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的投入,却是长效性质的,一次性投入,有长久的效果。

在科技方面,无须多言。现在每个农民都知道科技的重要性。关键是加强科研,尤其是在种子技术和作业机械化技术方面。在大田作物方面,相对较好。现在的突出短板,是在小品种作物和园艺作物方面。国家需要在继续重视几种大田作物的同时,也加大在其他作物上的科研投入力度。

此外,还有一点,也极其重要,这就是各个地区,都要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特点,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,进行作物生产的布局。只有这样,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好我们极为稀缺宝贵的土地资源,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只要切实落实好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,就能够实现这一点。

扶贫述职要用好群众评议这杆“秤”

□□ 文君

近日,湖南省桂阳县舂陵江镇横塘村办公楼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考试”,横塘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何志安当“考生”,向“主考”的36名村民述职。考什么? 主要围绕扶贫工作讲成绩、说举措、找问题、话整改,村民现场点评,提意见和建议。

“工作做得好不好,百姓心里有杆秤。”扶贫干部的工作,老百姓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,只有踏踏实实工作,才能获取漂漂亮亮的“分数”。横塘村是省级贫困村,原有贫困村民142户395人。近年来,在工作队帮助下,建立村卫生室、文化广场、通村公路等,同时大力发展生猪、烟叶、水稻等产业。2016年底,横塘村整村脱贫,目前贫困村民降至12户31人。最终,36名村民在“测评表”上为横塘村扶贫工作打分,平均得分为94.2分。扶贫工作队工作成效得到了群众认可。

帮扶工作队队长向村民述职,可谓好处多多。一是通过述职把工作向村民报告一下,让群众来评价,无形中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,融洽了党群干群关系。二是帮扶效果好不好,脱贫工作实不实,把“裁判权”

交给村民,让村民来“主考”,能够倒逼帮扶干部主动作为,务实工作。三是利用述职契机,把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改进措施摆出来,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,推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。

向村民述职,也是帮扶干部自信的一种表现。因为只有扎扎实实做工作了,为民服务做到位了,才会有不怕村民挑剔、吐槽和评议的自信。如果没有平时的扎实工作,没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,也就很难在村民评议的时候获取“高分”,也就没有信心向村民述职。

帮扶工作队队长当“考生”,村民当“主考”,这种“考试”能真正“考”出成绩与问题。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,广大帮扶干部使命艰巨、责任重大。作为在一线工作的帮扶干部,工作干得怎么样,是否尽职尽责,是否清正廉洁,给群众办了哪些实事、好事,工作中有没有打着为群众办事的旗号,搞些急功近利的“花架子”,做些表面文章,群众心里最清楚;帮扶干部作风实不实,村民满意不满意,老百姓的评价最客观。因此,各级各地在开展扶贫述职的时候,要结合本地实际,创新方式方法,用好群众评议这杆“秤”。

如何认识我国粮食安全的两个基本问题?

□□ 柯炳生